

近现代名家讲义叢刊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校補本

朱東潤 撰

陳尚君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近現代名家講義叢刊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校補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校補本) / 朱東潤撰；陳尚君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1

(近現代名家講義叢刊)

ISBN 978-7-5325-8246-4

I . ①中… II . ①朱… ②陳… III . ①中國文學—文學批評史
IV . ①I206.0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39404 號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校補本)

朱東潤撰 陳尚君整理

責任編輯 | 劉 賽

裝幀設計 | 黃 琦

技術編輯 | 富 強

出版發行 |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印 刷 |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開 本 | 890mm×1240mm 1/32

印 張 | 15.5

字 數 | 415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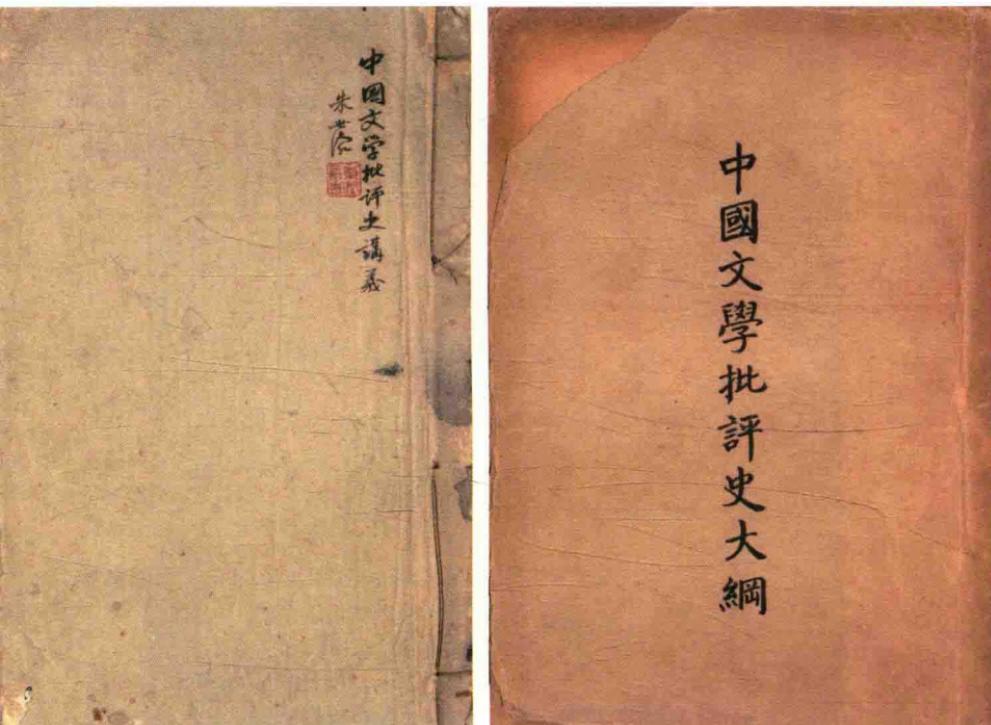
版 次 |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 ISBN 978-7-5325-8246-4/I · 3088

定 價 | 68.00 元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朱東潤先生與夫人鄒蓮舫、次子朱君遂合影於 20 世紀 30 年代，時方任教武漢大學



左：《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1939年樂山版書影

右：《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初版重印本（1946）書影

眉，分別陳述，亦有一節之長。此則分類之不盡當而不妨置之者又一也。述三
者，略當舉隅，皆非識詞，無事裨悉。今茲所撰，概取簡要。凡陳氏所已詳，或
從闕略，義可互見，不待複重，至於成書，請俟他日。

第一 文學批評

批評二字，古無定名。諸書經結志文章流別志論、始林論、文心雕龍等諸書皆附列總集之後，所謂解釋評論，總於此編者也。舊唐書因之。新唐書藝文志別立文史類，凡四家四部十八卷，其不著錄者又若干。宋史因之，凡九十八部六百卷，然如賦詩話召溪漁隱語等又別入小說類，則分部別居，蓋有不盡然者。明史藝文志亦有文史類，凡四十部二百六十卷，其錯入小說類者尤見。如李清、王世貞、凌濛初、金瓶梅等蓋視宋史為加謹矣。清人四庫總目始別有詩文評類，然亦小能盡賅文學批評，如梁府指迷、詞苑叢談之附入詞曲類者是也。大率近人分類雖觀古益精，而文學批評一語之成立，猶待至與西洋文學接觸而後。

高斯 Edmund Gosse 英國有名之批評家也，其論批評曰：「批評一語，出自希臘語裁判之字，所以判定文學上或美術上美的對象之性質及價值之藝術也。第一對於任何物事之

Scribner's List Critics
History of Criticism
New Civilization
Cyclopedia of Criticism & Book-making
古今評論及版權傳本

性質，先須成立其判決并發表之。」埃諾德日：「批評者一種無所為而為之努力，對於世間最佳之思想及知識，自覺覺人者也。」因此復有第二義，即對於文學或美術之創作，分析其特點及性質，公之於世，而其自身復成為一種獨立之文學也。至於指批評為索瘤求疵之作，言之者雖多，其言絕無所據。……真正之批評既無勝義，亦無方義，其作用在屏除私見，及偏見而發為公正之判定而已。」

高氏又曰：「自歷史的方面言之，亞里多德殆為文學批評之始祖。其他批評之著作，視亞氏時代僅有更遠者，然自亞里多德之 *Poetics* 及 *Rhetoric* 出而後文學批評始入確定之境。其時文學在一方面極為繁富，在另一方面則又極為缺乏。盛惟保列 Sempronius 論之，謂亞里多德之論衡，則以其時小說尚未成立，不無遺憾，其論散文，則又以雄辯術獨擅一時，不無偏重，此言誠有見也。蓋古代之批評大抵如斯矣。」

右述兩節，論極持平，其他證引，不待更述。然中國所謂文者，與西方之論不必契合，茲就文之廣義來之。易貞卦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白虎通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之不遠。」白虎通曰：

安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與兄宗道伯、弟中道小篤齊名。而中郎名最盛，舉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庶吉士解編，累官員外郎，調吏部，累居三十八年卒，年四十三。中郎詩文主於真而其病流於率，此則公安派之得失所在也。牧論之曰：「中郎之說出王季之雲霧一擣，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濶心靈，搜剔慧性，以盡漁事掩源之病，其功偉矣。」施餘傑出，矯枉過正，於是狂怪交崩，謬怪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

一其害甚尤。

中郎作文立論，皆率性而成，欲并自古之執範，一切抉翼而後快。記百花洲云：「江迷

之間百花洲花盛開，全往觀之。余曰：無他，惟有三十萬株，雖大蕭蕭，氣氣數里而已。」游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臥。」偶見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反成笑，自喜笑中意，一哭又一跳。」此種文字，雖以規

矩，皆不成爲詩文。

惟其如此，其論文乃有出於懷諱之外者。如云：

舊中藏墓集書，嘗省塔具，宅畔置一館，館中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碑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遂文廟宋陵晉之陋，近完

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反成笑，自喜笑中意，一哭又一跳。」此種文字，雖以規矩，皆不成爲詩文。

蓋中郎不苟過，至見生情觸目，率存心人之活潑空虛而已。

王昌黎詩序云：「予嘗謂古今之詩，當以李杜爲第一，以白石、東坡爲第二，以蘇、黃爲第三，以王摩詠爲第四，以歐陽子爲第五，以王荆公爲第六，以王右軍爲第七，以王昌黎爲第八，以王荊公爲第九，以王荊公爲第十。」

少年工詩韻，頗滿拾得，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織，一再快西風，聽君酣苦戰。——聽朱生說水滸，我心悲。也

新詩日日子餘音，詩中無一豪民子。……自從老杜得詩名，毫若蠅頭戲兒戲，吉旣無

唐哩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題畫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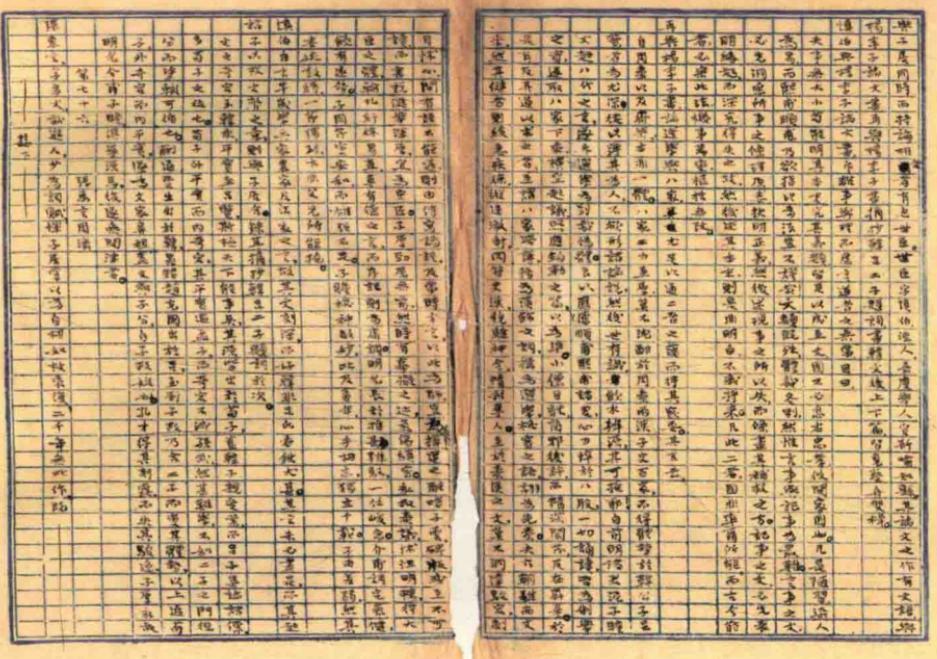
司馬遷與關漢卿並稱，始於嘉靖二年，韓邦靖死時，其兄邦基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輩，能爲吾黨思弟痛弟之情乎？」自中郎後至清而金人璠有六才子之說，小說戲

曲，遂與史傳詩文並佔文壇一席地矣。至顧慶蒼時，則於臺君愛國之譖，一併指摘，自當世言之，同爲舉人聽聞之論，然中郎自有其理論在。

中郎批評論之核心，在於認古今之變。雪濤閣集序云：

文之不能千古而今也，時使也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諱吉之跡，而冒以爲古，是惑嚴冬而襲夏之易者也。……夫法因於微而成於著者也，矯六朝排廢訂綱之習者，以洗濶勝。訂綱者固濶勝之因也，然其過在於尋繢，盛唐諸人以圓大

《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1937年修訂本之寫定目錄，最後兩章未寫入



《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1937年修訂本殘稿之一頁

整 理 說 明

朱東潤先生撰《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1944 年出版于重慶開明書店，雖然此前已經有郭紹虞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和羅根澤先生《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出版，但都僅涉及唐以前的部分，完整地勾勒出從上古到清季文學批評史的專著，朱書是第一部。今人多將郭、朱、羅三家視為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奠基學者。朱先生早年有良好的舊學訓練，又留學英國，系統介紹西方的文學觀念與研究方法，曾長期教授英語與英國文學，專治文學批評史，有獨到的觀察與建樹。該書特點，正如朱先生《自序》所言，一是全部以個人立目，盡量規避作時代或宗派的敘述；二是對於每個批評家，常把論詩論文的主張放在一起討論，避免割裂；三是特別注重近代的批評家，即明清兩代的文學批評，幾占全書之半。章培恒先生曾總結本書的成就，一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框架的奠定”，二是“新穎文學觀念的貫徹”。

朱先生早年任教于梧州廣西第二中學和南通師範學校，均授英文。1929 年移教席至武漢大學，初仍授英文，因文學院院長聞一多教授之建議，從 1931 年始授中國文學批評史，至次年完成講義初稿，凡四十六章，止于明季錢謙益。1933 年續寫完成，凡七十五章，除續寫錢謙益以後二十四章，以前部分另新寫五章，其他部分也多有改動。以上二稿均有武漢大學校內鉛排線裝本，先生自存本且多有詳密批校，可以看到授課當時的準

備細節，也可以見到在閱讀思考中不斷增訂的痕迹。這一時期，先生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連續發表文學批評史專題研究論文九篇，後結集為《中國文學批評論集》（開明書店，1940年）。在此基礎上，先生從1936年到1937年間，對前此講義作了大幅度增補修改，準備正式出版，但抗戰的全面爆發，改變了他的原有計劃。從先生自傳和今見文本分析，他的定稿工作在1937年末已經全部完成，其中前半部即至第三十三《朱熹附道學家文論》止，已經排出校樣，先生自存兩份，估計是該年末歸泰興時攜歸；下半部，先生《大綱·自序》云留在武漢，但他在抗戰後取歸存寄書稿，且保存至今者，祇有最後十八章，即從六十章末段到書末，中間部分之寫定本已經無從尋覓。先生于1939年1月到西遷樂山的武漢大學任教，該年所引講義即將1937年本之前半和1933年本之後半併合，略作修訂，以應教學之需。1943年往中央大學任教後，感到留滯武漢的手稿已經“沒有收回的希望”，乃以樂山本為基礎付印。戰爭造成學術之殘缺，于此可見。

先生1937年寫定本，一是重新調整了全書的篇目，二是將前此講義作了較大幅度增刪。周興陸教授曾將全稿前半部的講義和《大綱》作了比讀，揭示其改動幅度之大。後半部分目前僅存最後十八章手稿，為先生據1933年講義原本剪貼，新增改寫部分則全為手定。目前分析，大約先生在1937年末離開武漢時，將下半部較早完成的部分已經送往印刷廠排印，最後完成的部分則仍留行篋，寄存武漢。九年後再到武漢，交廠的部分已經無從覓跡，而偶存的部分則因生活動蕩（其後他曾頻繁轉換學校），再加上鼎革後的風氣變化，不免意興闌珊，再無重新補罅的興趣。

目前要瞭解先生1937年修訂本全貌，特別是已經殘缺的下半部全貌，僅有兩個線索。一是先生自存1933年講義卷首目錄有較多批改的記錄，大約主要是1937年定稿前陸續修訂的思慮之記錄；二是前述最後十八章前有兩葉章節目錄（比照1937年修訂本殘稿正文知，該目缺寫最後兩目），應該是修訂期間逐漸寫定。

從先生《大綱·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對 1937 年增訂寫成稿之珍惜，當年因戰爭沒能收回手稿，祇能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後出版，留下長久的遺憾。《大綱》1944 年問世，在 50 年代和 80 年代曾兩度再版，始終沒有作大的修改，但先生一直保存 30 年代在武漢大學的授課講義，以及最後十八章的改定稿。

2014 年在編訂出版《朱東潤文存》的同時，我多次託武漢大學的朋友調查校史檔案，希望當年交稿付排的講義第三稿下半卷或可有特殊的機緣得到保存，務使全書終成全璧，也為次年的民族戰爭勝利紀念留一特殊記錄。但友人寄示存檔目錄，並沒有這樣的機緣。

但我仍然希望就目前能够見到的文本，盡最大可能地反映朱先生當年最後定稿的面貌，也希望能够將目前能够見到在先生保存的四份講義中涉及學術增刪的部分，給以適當的揭示和保存。我特別想強調的是，即使《大綱》出版時，“一切的形式和內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而歷次講義中這些特徵當然更加顯著。但我在很仔細地對讀了先生各本講義後發現，覺得全書要旨儘管有所微調，對引證文獻也有新增（如涉及聲律論初取疑偽書《二南密旨》，後改較早而可靠的《文鏡祕府論》），涉及時代、文風、作家、批評家的評價，也都有一些變化。前期講義的敘述可能有些不精密處，但也包含許多坦率而真誠的論述。最後定稿中因以批評史為主，將講義中涉及時代風氣、文學論述、作家人品以及中外比較的內容有較多的刪除，其中有許多論述極其精彩。而現代學術史的研究，尤其重視一部學術著作成書過程中的文本變化。我偶得機緣見到這些文本，家屬也授權可以作充分的展示，雖然知道這樣未必完全符合朱先生本人的意願，仍願意以月餘之辛勞，完成這一份工作。

述本次整理體例如下。

全書以《大綱》1944 年初版為依據（我自藏工作本為開明書店民國三十六年 3 月第 3 版），最後十八章則據先生自存 1937 年修訂本原稿。

《大綱》定稿時刪棄之原講義內容，凡具有學術參考價值者，皆節錄加

注於相關內容之下。凡前二次講義皆有之內容，以 1932 年本為主。1937 年定稿已失去部分，涉及章節調整和內容增刪部分，在歷次講義批語中有線索可尋者，也都有所記錄，存於書末附錄二。

整理所據參校訂補的依據為先生自存歷次講義和修訂稿本，具體文本詳附錄四之拙文。

《大綱》及講義敘述或引證文獻之筆誤，或因當年所見文本未能盡善而有出入者，均曾作過技術處理，全書標點和書名號也多有調整，均未一一說明。若有誤失，責任在我。

先生歷次講義，在後來之教學準備和授課實踐中，留下數量鉅大的批注，內容一是補充文獻，二是糾正愆失，三是提示講授中的細節。本次僅採據極少數涉及糾誤和篇章調整的內容，其他皆不涉及，祇能留待異日。

書末增加幾個附錄，一是《〈大綱〉與歷次講義章節異同表》，以見成書過程中章節之調整；二是《歷次講義刪存及〈大綱〉再版後記》，包括三次講義的題記和刪改幅度較大的部分及《大綱》先後兩次再版的後記；三是講義中保存的三次授課試題，可見開課考績的實施情況；四是 2013 年拙撰，這是一篇根據先生自存講義分析研治批評史歷程的論文。

謝謝朱邦薇女士信任并授權我完成上述工作，也謝謝上海古籍出版社長期以來對出版朱先生遺著的堅定支持，謝謝責編劉賽君的認真審讀與糾訂。整理誤失處，敬請方家賜教。

受業 陳尚君 2016 年 6 月 15 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

自序

民國二十年，我在國立武漢大學授中國文學批評史，次年夏間，寫成《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初稿。二十一年秋間，重加訂補，二十二年完成第二稿。二十五年再行刪正，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第三稿。二十六年的秋天開始排印。這時對外的抗戰爆發了，烽火照遍了全國，一切的機構發生障礙，第三稿印成一半，只得擱下，其餘的原稿保存在漢口。二十七年春間，武漢大學西遷。就在這一年，放棄武漢，整個的戰局起了變化。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講義》第三稿也只剩了上半部。

在這幾年的中間，自己曾經幾次想把這部書重行寫定，但是手邊的書沒有了，手鈔的筆記也沒有了，連帶想把第二稿的下半部重行刪正，也不可得。承朋友們的好意，要我把這部書出版，我總是遲疑。我想待第三稿的下半部收回以後，全部付印，因此又遷延了若干時日。事實終於顯然了，我的大部的書籍和手寫的稿件都沒有收回的希望。所以最後決定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併合，略加校定，這便是這部《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的前身。在這裏，一切的形式和內容，無疑的都流露了講義的氣息。

講義便有講義的特點。因為授課的時間受到限制，所以每次的講授不能太長，也不能太短，因為講授的當中不能照本宣讀，所以講授的材料不能完全擋入講義。因為在言論中要引起必要的注意，同時因為引證的

語句，不能在口頭完全傳達；所以講義中間勢必填塞了許多的引證，而重要的結論有時不盡寫出。因為書名人名的目錄，無論如何的重要，都容易引起聽衆的厭倦；所以除了最關緊要的批評家和著作以外，一概不輕闡人。這些都是講義的特點，姑不必問其是優點或是劣點。

然而講義確有講義的劣點。因為要避免掉書袋的批評，所以引書不一定注明篇卷。因為校對的疏忽，所以字句的誤植，標點的錯排，有時多至驚人。這裏的責任，有些屬於我自己，也有些不屬於我。在出版的時候，當然應該全部改定，責無旁貸。在平時，本來應當如此的，然而現在是戰時。戰爭增加了無限的光榮，然而也發生了不少的困難。戰時的書肆，貧乏到怎樣的程度，戰時的圖書館，凌亂到怎樣的程度，在太平了以後，大家也許不易想象，但是身經戰時的我們，正在抗戰的當中，必然會加以體認。我相信寬恕的讀者對於這本書的疏忽，也許會加以格外的優容。我也希望還有書籍湊手、重新寫定的一日。然而我對於這本書的疏忽，祇有負責，祇有引咎。

在我的初稿寫成以前，陳鐘凡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已經出版了；在初稿完成以後，郭紹虞先生的和羅根澤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也陸續出版。此外還看到許多關於中國文學批評的著作。諸位先生治學的熱忱和撰述的價值，深刻地引起我的欽服。但是我對於我這本書的責任，一切由我自己負擔。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相同的地方，我不曾作有心的抄襲；在和諸位先生的著作顯然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曾作故意的違反。討論一切事物的時候，有一般的局勢，有各殊的立場。因為局勢相同，所以結論類似，同時也因為立場不一，所以對於萬事萬物看出種種不同的形態。這本書的內容，和諸位先生的著作有異同的地方，只是事理的當然，原不足怪。我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不同的地方祇是看法的不同，不敢抱自是的見地。

第一個不同的地方，是這本書的章目裏只見到無數的個人，沒有指出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或者這是怎樣的一個宗派。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